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 资产阶级社会学史

[苏] N·C·科恩 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C91-091
乙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 资产阶级社会学史

[苏]И. С. 科恩 主编
梁 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И. С. Кон
История буржуазной
социологии XIX—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9

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 1979 年俄文版译出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
资产阶级社会学史
〔苏〕 И. С. 科恩 主编
梁 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75 插页 0 字数 297,000
1982 年 7 月第 1 版 198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书号：2188·10 定价：(七)1.4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译者的话

社会学，在我国长期遭到冷遇。人们当时认为，只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就足以研究社会了，至于社会学，则是维护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伪科学。因此，二、三十年来这方面的书出得极少，几乎是空白的。大学中社会学课程被砍掉，社会学工作者纷纷改行，我国社会学园地一片荒芜。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终于在七十年代末期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大学里相继恢复或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全国成立了专门研究社会学的机构，学术活动开始正常化，并多次参加国外召开的世界性的社会学会议。但由于历史原因，可供教学和参考的书籍甚少。人们除对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斯宾塞等略有所知外，对于现代社会学的各个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则知之甚少。本书翻译出版，正是旨在多少弥补这方面的欠缺。

本书对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剖析了社会学所由产生的理论根源和社会前提。书中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斯宾塞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的生平、思想、著作等作了细致的介绍；接着对社会学中的进化论、机械论、摹仿论、地理决定论、生物有机论、心理社会学等流派加以扼要的分析和评述。本书后半部对现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滕尼斯、齐美尔、杜尔克姆、维贝尔、帕累托等人的学说分别作了详细的介绍。此外，书中还援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学的评论。本书内容充实，提供史料较为丰富，可供社会学研究工作者以及大学文科师生阅读、参考。

本书主编 И. С. 科恩系苏联哲学教授，除本书外还著有《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1964年)、《个性社会学》(1967年)、《历史与社会学》(1970年)等。

1981年5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 章 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	1
第二 章 奥古斯特·孔德和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产生.....	14
第三 章 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观念.....	35
第四 章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社会学中的自然主义.....	49
第五 章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心理社会学.....	90
第六 章 十九世纪的经验社会研究.....	117
第七 章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社会学中的进化论 危机和反实证主义思潮.....	146
第八 章 斐迪南·滕尼斯的社会学观念.....	170
第九 章 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社会学.....	188
第十 章 埃米尔·杜尔克姆的社会学.....	215
第十一章 马克斯·维贝尔的社会学.....	267
第十二章 威尔夫累多·帕累托的社会学体系.....	327
结 束 语	352

苦冥是那界而闻立称学者，而然。秉关卫脉的流派而学固不个善。
。竟一不全宗爵家脉处也象故而学会并，天令立势固。而变固，而
颤固。而固不具一端而发，中史识分属个壁而学林门玄而脉固
尖虽然毋立腰，虽失其学会并。良善而土义脉而义宝于立处对不
尖而脉而气资脉合引思京早言式首，而脉而半脉思而脉
会并校计册，持氏脉而脉式脉思而脉普脉学会并。而脉而半脉
脉任何一门科学的历史都是它的自我认识的必要组成部分。学者彻底研究自己那门学科的历史发展，便能深刻了解它的现状、矛盾和问题。毫不奇怪，随着科学的发展，对科学史的兴趣也日益增长，这对社会学来说也完全如此。

与自然科学不同，对社会学来说，它本身的历史并不是一个附带的问题，而是要用同研究其他社会问题一样的方法论手段，直到用数量方法来加以研究的一个内容丰富的课题。^①近二十年来，在许多社会学书籍中，对于社会学史研究的比重大大提高了。它们的题材也扩大了。除了社会学理论史以外，还产生了经验的社会研究史。人们开始重视社会学制度化的历史，重视研究它的社会功能以及它与其他科学的相互关系。要1970年，在第七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根据苏联学者的倡议，在国际社会学联合会范围内建立了社会学史研究委员会，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1978年，美国开始出版关于社会学史的专门杂志。社会学史问题在国际社会学大会和科学史讨论会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但是，研究社会学科学史却带来了许多困难。任何一门科学史都包含有它的对象、方法、概念体系、内部逻辑结构、实际运用领域、它的制度化、同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等的形成史，以及这门科学

^① H. A. 果洛先科：《作为学术课题的社会学史：国外研究中的主要方法分析》，载《社会学研究》，1976年，第1期，第164页。

各个不同学派和流派的相互关系。然而，各学科之间的界限是灵活的、可变的。即使在今天，社会学的对象也被规定得完全不一致。何况在这门科学的整个漫长历史中，这种统一是不可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定义和涵义上的差异。社会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尖锐的思想斗争的领域，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资产阶级理论尖锐斗争的领域。社会学作者的思想方针和理论方针、他们对社会学现状的理解，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历史观点。社会学史形成和分期的原则，在不同的作者那里，都是极不相同的。

我们不打算从事社会学史的史料研究，这项工作有待于研究者去做，但可以列举一系列作为社会学史教程和学术专著之基础的原则。

- (1) 按照年代次序简单地叙述一下不同社会学家和学派的观点，并对它们的内容进行最低限度的分析。^①
- (2) 按照空间和时间先后的原则，也即按照各个国家和各个时期组织材料。^②
- (3) 把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方面和要素，并放在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的背景上来考察。^③
- (4) 把社会学理论继承和发展的历史作为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来考察，其中社会学思想的不同流派，或者作为作者自己观点形成和准备的阶段来考察，^④或者作为供选择的和相互补充的材料来

① E. S. 博加德斯：《社会思想的发展》，第4版，纽约，1960年。

② H. 莫斯：《社会学简史》，伦敦，1962年；D. A. 米切尔：《社会学一百年》，芝加哥，1968年。

③ H. 贝克尔、H. E. 巴恩斯：《社会思想从古老传说到科学》，第3版，纽约，1961年，第3卷；I. M. 蔡特林：《意识形态和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恩格尔伍德山崖（新泽西州），1968年。

④ T. 帕森斯：《社会行为的结构》，第2版，纽约，1949年；P. A. 索罗金：《现代社会学理论》，纽约，1928年。

考察。①

(5) 社会学中某种相当一般的哲学方针，例如实证主义的形成和表现的历史。②

(6) 某些基本的社会学范畴的演变史，这些范畴的内容和功能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有变化。③

(7) 以往个别杰出的社会学家所撰述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其中每一篇都联系到他们那个时代、个人和学术活动的特点，并且放在一定的历史展望中来考察。④

(8) 一系列专门从事个别最重要的、具体的研究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仔细分析了理论观念与经验方法相互联系的演变。⑤

(9) 传记体方法，用这种方法从社会学家的个人特点和生活经验中引申出社会学概念的内容来。⑥

(10) 以方法论和研究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经验社会研究史。⑦

(11) 社会学制度化历史，社会学向大学学科的转变，学术机构

① T. 阿贝尔：《社会学理论基础》，纽约，1970 年；R. 阿隆：《社会学思想诸阶段》，巴黎，1968 年；D. 马丁达尔：《社会学理论的本性和类型》，纽约，1960 年；J. 斯泽潘斯基：《社会学：课题和方法的发展》，华沙，1969 年；N. S. 蒂马舍夫：《社会学理论。它的起源和发展》，第 3 版，纽约，1967 年。

② I. C. 科恩：《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列宁格勒，1964 年；A. 吉登斯：《实证主义和社会学》，伦敦，1974 年。

③ R. A. 尼斯比特：《社会学的传统》，纽约，1966 年。

④ L. 科泽尔：《社会学思想大师：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的思想》，第 2 版，纽约，1977 年；F. 费拉罗蒂：《奥古斯特·孔德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的社会学思想》，罗马，1974 年；G. 波吉：《社会偶像：论托克维耳、马克思和杜尔克姆的社会学理论》，斯坦福，1972 年。

⑤ J. 马奇：《科学社会学的起源》，纽约，1964 年。

⑥ A. 米兹曼：《铁窗：马克斯·维贝尔的历史解释》，纽约，1970 年。

⑦ B. 莱居耶、A. R. 奥伯歇尔：《社会学：社会研究早期史》，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纽约，1965 年，第 15 卷，第 36—52 页；A. 奥伯歇尔：《1848—1914 年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海牙，1965 年。

关、教研室、杂志等的创办和发展。^①

①。禁禁

(12) 对现代某些最重要的问题作回顾性的分析，这些问题是怎样由以往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提出来的。^②

②。史记的底本

以上这些方法都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补充，表达了对同一个对象的不同观点。这些方法往往甚至结合在同一部著作中，特别是在普通教科书中。但是，材料结构和叙述的形式问题也是同课题的内容和对社会学对象、发展总趋势的不同理解密切相联系的。

在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学史著作中，往往缺乏历史主义，在评价和选择材料时出现主观主义，力图贬低或模糊所考察的理论的阶级思想意义，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不正确的解释。例如，在一些旧的社会学史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往往被压缩到仅有几页，而且是用批判的、藐视的笔调来写的。近年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普遍增长，资产阶级学者中便很少有人敢于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学遗产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斗争史经常被简单化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破天荒第一次表述的许多原理被别有用心地或者无知地强加于别的作者头上。因此，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史观点不仅具有理论的和启蒙的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那些阐述社会思想史和批判他们当时思想学派和流派的经典著作中，包含着社会学史观点的基本原理。普列汉诺夫、A. 拉布里奥拉以及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对社会学史观点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系二十至三十年代苏联社会学的继续，当时曾发表过批判诸如埃米尔·杜尔克姆、马克斯·韦贝尔等著名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重要文章。苏联的哲学史家和社会政治思想史家对社会学史

① T. И. 克拉克：《发起人和赞助人。法兰西大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73年；《经验社会学的确立：持续、中断和制度化的研究》，A. 奥伯歇尔编，P. F. 拉扎斯菲尔德序，纽约，1972年。

② L. 卡瓦里：《社会变革》，波洛尼亚，1970年。

的研究曾作出重要的贡献。^①

随着社会学变成一门独立的科学，社会学史研究的题材也有了显著的扩大和丰富。除了一般性的著作^②以外，还出现了论述以往个别社会学家的学术论著^③、一系列专题文集和社会学个别领域史的著作。^④在《哲学百科全书》上刊载了许多社会学史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和俄国社会学史开始得到了有系统的研究。^⑤对接近于社会学的一些学科——政治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和民族志学等的历史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在社会主义各国，广泛开展了社会学史的研究工作。

本书作者们并不打算罗列这个伟大而又复杂的时期社会学史的所有课题，而只想向读者提供关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中的主要方向和趋势的看法，否则读者便不能了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进一步演变和现在的状况。

本书系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史研究室集体编写，主编为哲学博士 И. С. 科恩教授。第一章、第五章、第七章、引言和结束语由 И. С. 科恩执笔；第二章、第十章、第十二章——Е. В. 奥西波娃；第三章——И. С. 科恩；第四章——А. Б. 霍夫曼和 А. Д. 科瓦列夫；第六章——М. С. 科瓦列娃；第八章、第九章——Л. Г. 伊奥内伊；第十一章——П. П. 海登科。

① A. С. 博果莫洛夫：《十九和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发展思想》，莫斯科，1962年；《哲学史》，莫斯科，1957—1965年，第1卷，第1—6页；И. С. 纳尔斯基：《实证主义史纲》，莫斯科，1960年；《实证主义和科学：批判纲要》，莫斯科，1977年；Г. П. 法兰佐夫：《社会思想的历史道路》，莫斯科，1965年。

② И. С. 科恩：《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列宁格勒，1964年；Г. В. 奥西波夫：《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莫斯科，1964年。

③ Е. В. 奥西波娃：《埃米尔·杜尔克姆的社会学》，莫斯科，1977年。

④ 《十九—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学简史》，莫斯科，1968年；Л. П. 拉舒克：《历史社会学导论》，莫斯科，1977年，第1册。

⑤ 《俄国社会学思想：十九世纪后三十年至二十世纪初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大纲》，列宁格勒，1978年；Б. А. 恰金：《苏联社会学思想史纲》，列宁格勒，1971年。

第一章 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

一、社会学知识的思想—理论前提

社会学作为一门关于社会体系发展和作用的规律性的科学之所以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并不是因为当时出现了新的研究对象，而是在其他的社会科学中产生了一些不可能用传统方法和不可能在现存知识体系范围内予以解决的课题。

社会学的世界观（或者社会学的思维方式）要求：第一，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按照自己固有规律发生作用和发展起来的整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①；第二，在研究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方面有自觉的方针，以区别于对理想的社会制度作空想主义的构思；第三，借助于经验的研究方法（虽然对这些方法的理解也许是各不相同的），反对思辨的哲学体系。

这种方法的因素是在近代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范围内逐渐形成的，也是随着经验的社会研究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化而逐渐形成的，其中对这一过程产生有力影响的是列宁所指出的“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②。

社会作为一个体系的问题，十七世纪“社会物理学”理论早已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45页。

②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90页。

提出了。^①既然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社会学在方法论上也就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如果说，星星世界在这些理论中被描述为各种星体的机械的相互作用，那么社会也被看作是由社会引力和社会推力把各个个人联系起来的一个特殊的天文系统。

“自然的社会理论”曾经是唯理论的。这种理论的目的不是记述社会事实，而是把社会事实归结为自然界（包括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为数不多的一般规律，而这些规律的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十七世纪的思想家们以数学（几何方法）、天文学和力学为榜样，力图采取广泛的演绎推理，并且不但蔑视历史，而且也蔑视当时已初次取得可观成就的社会统计。^{因是不关，即中坚世武于生造如浪不休}十八世纪的社会哲学由于不是以天文学和几何学为方针，而是以牛顿的物理学为方针，所以在自己的概括中已经不是那么机械主义地，而是比较小心谨慎了。^{不而中坚世武于生造如浪不休}

中世纪哲学及其思想继承人——浪漫主义-传统主义者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是一个公社，其中社会经济联系是与道德联系分不开的，是由于传统和宗教而人格化和神圣化的。启蒙学者把中世纪“村社性”这种理想化的模式同建立在劳动分工和个人之间合理交换基础上的社会的“机械”模式对立起来。把社会比拟为一部机器，由相等于哲学-历史上鲁滨孙式的结构物组成，这种比拟是素朴的，而归根结底也是唯心主义的。但是，这种比拟为分析和弄清各种社会制度和体制（国家、法律、经济、文化）的实在功能提供了可能性，这些功能在“有机的”模式中被区别开来是很勉强的。^②

首先是搞清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别。“天赋人权”论者和国家起源于契约论者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他们的观点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自然的”社会结构与“人为的”法律制度的划分

^① 详细可参阅 E. 斯彼克托尔斯基：《十七世纪社会物理学问题》，基辅，1917年，第2卷。^② 早

则为理解经济生活不依赖于政治这点打开了道路。

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者(托马斯·霍布斯, 约翰·洛克)、苏格兰道德学家(大卫·休谟, 亚当·斯密, 亚当·弗格森等)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保尔·昂利·霍尔巴赫, 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都一致认为, 人的行为原则上是利己主义的, 是为了获得个人的某种好处。但是, 从把个人或集团的社会行为的动机归结为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到确定这些利益取决于个人或集团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 这不过是迈出了一步而已。(关于各种社会利益冲突的命题逻辑地得出了关于个人行为的自觉动机与其社会效果原则上是不可以比较的结论。苏格兰道德学家强调指出, 人们的社会行为, 更不用说这种行为的结果了, 都是决定性地由理性以外的、本能的力量和欲望所控制的; 人们的各种举动, 错综复杂, 相互冲突, 产生着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所有参加者来说是完全预见不到的和意料不到的结果。由此可见, 社会整体的结构和动态, 如不把它们同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个人(包括政治家在内)的意识相关联, 也是可以弄清楚的。结果, 为了了解权力的人性(而不是神性)所必需的“社会契约”这个公设本身, 便成为多余的并且遭到严厉的批判。

重农学派——“政治经济学……通过重农学派才变成一门特殊的科学”^①——有意识地根据经济生活对法律而言是自主的这一原则认为, 经济力量自发的竞赛比行政官僚主义的措施能更忠实地和可靠地导致对人人有益的结果。

弄清所有制经济关系的意义, 认真地把社会思想引导到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的作用问题, 这从让·雅克·卢梭那时起就已开始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从社会分工引申出社会划分。“还在十八世纪末, 有人就已经使用了同当时所通用的“等级”概念不一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第3卷, 第483页。

的“阶级”概念。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奥古斯丹·梯叶里对阶级斗争这一概念作了通俗的解释。虽然新名词尚未具有象在马克思主义中那样严谨的意义，但这些新名词明显地指着新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不同于中世纪的等级性，它首先是建立在财产的差别这个基础上的。

自发地形成社会关系的“现实”世界，——它不同于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世界，被冠以市民社会的名称。这个名称在术语上是同民法（私法）与公法之间的传统差别有联系的。但是，黑格尔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更深刻的考察，他认为市民社会既是统一的（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一个人没有别人就不行），也是分散的，被矛盾的利己主义的利益弄得支离破碎。而既然黑格尔已强调指出，市民社会的尖锐矛盾并不是任何时代政治上所固有的，而只是“当时的”时代所固有的，因此这个名词也就具有历史的意义，也即一方面指称社会整体的一定领域、一定部分，另一方面指称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的资产阶级社会。乔巴蒂斯特·维科从概念上对社会和文化作了划分的尝试，以及启蒙学者们对进步思想所作的研究，都是十八世纪哲学上的极其重要的成就。

在对资产阶级时代进行思想论证方面发挥过作用的启蒙学者关于进步的理论，在许多方面为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公式作了准备。但是直线式的社会发展概念却往往带有公开的目的论的性质：被哲学家定为公设的目的，实际上扮演了天意的角色。此外，对深刻的社会变化的确认，往往同以人本主义精神解释的“人性”不变的原则并行不悖。把“永恒的和不变的”规律的想法用到历史资料上去，是最靠不住的。企图用同一个公式来说明社会的总结构以及它在一定时候的具体状况，必然会遭到失败，而把社会变化、发展和进步的概念混为一谈，则会造成历史按照预定路线而运动的错觉。

由此可见，虽然近代社会哲学研究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但它的体系还仍然是思辨的和不具体的。然而除了十七至十八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以外，经验的社会研究，首先是社会统计开始发展起来。这种研究的兴起出于实际的管理需要，一开始是有局限性的，在方法上是不完善的，在不同的国家里也是各不相同的。^①但这种研究逐渐打开局面并取得了力量。在法国，制订了大规模统计性民意测验和经济调查的技术。十七世纪英国“政治算术家”威廉·配第、约翰·格劳恩特、格雷戈里·金和爱德蒙·哈莱为现代人口学奠定了基础，并且定出了一套从数量上研究社会规律性的方法。

上述十七至十八世纪的经验研究，看起来不过是描述性的，缺少总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些研究者由于缺乏社会学理论，只好依靠自然科学概念和一般哲学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经验社会学的创始人中，有许多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哈莱，拉普拉斯，毕丰，拉瓦锡），他们对社会过程的研究是同他们的自然科学活动有机地联系着的。

这些学者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并不简单地“使用”自然科学中的那套现成的方法：许多一般的科学方法和理论正是根据社会材料研究出来的。例如，拉普拉斯的《概率论的解析理论》（1795年）在很大程度上是拉普拉斯本人和其他学者对社会人口学研究的成果。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学概论》（1798年）一书的风行一时，在不小的程度上也说明了他想对人口增长作出严密的数量公式的意图，尽管这部著作是明显地反动的，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除了社会统计以外，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人种志学研究的发展对社会学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伟大的地理发现时代

^① B. 莱居耶、A. 奥伯歇尔：《社会研究早期史》，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纽约，1968年，第15卷，第36—53页。

开始，游记体小说和关于海外各民族生活的故事成了欧洲有文化的人最喜爱的读物。可是在这些小说和故事中，事实真相往往同虚构紧密交织在一起。对于第一批历史学家、旅行家或移民者来说，他们所发现的“野人世界”，与其说是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是施加影响的对象。但是启蒙性的“自然人”理论激励着他们越来越积极地把“文明”风尚同“野蛮”风尚加以对比；野蛮人“如今被看作是原始人，欧洲人通过他们可以了解自己本身历史的特征”^①。

十八世纪中期，“人类学”一词还属于解剖学的词汇，它意味着“对人体的研究”。然而毕丰却已经把人类学定义为关于人的一般科学，包括语言学、文化学等在内。

在十八世纪，有人第一次尝试对各种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进行系统的描述和比较，往往偏重在历史方面（约瑟夫·拉菲托，让·尼古略·德梅尼埃，法朗索瓦·沃利内）。结果，思辨的哲学体系往往就同经过检验和确定的科学事实发生抵触，因为科学事实表明人类文化的统一和多样化问题的复杂性。

比较-历史方法不仅用来研究“未开化的”民族，而且也在法学、民俗学、语言学中运用。十九世纪初，思辨的社会哲学到处受到科学的、“实证的”研究思想的抵制。各种科学学科的分化和“分裂”过程加速了。随着法学和历史学从哲学中分出之后，政治经济学、人种志学、统计学和语言学也分出来了。这对一些新学科的产生来说乃是榜样和先例，同时，对某种新的智力综合，对关于人和社会的那门概括性的、但又不是哲学的（指不是思辨的）科学的需要也迫切了。

①全M·杜舍：《启蒙时代的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载《启蒙世纪》，莫斯科，1970年，第254页。

二、社会学的社会阶级前提

社会学的诞生也是同一定的社会需要相联系的。启蒙学者的社会哲学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崩溃过程和社会哲学在许多方面所预料到的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过程；同样如此，社会学也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对抗和由这些对抗所引起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反映而产生的。

十九世纪初，这不仅是资本主义鼎盛时期，而且也是它的矛盾初次明显暴露的时期。工业和城市的兴起，伴随着农民、手工业者和小私有者的大批破产。工厂劳动和工人生活的极端困难状况与资产阶级财富的增长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法国里昂纺织工人的起义、英国卢达分子运动^①以及稍后的宪章运动都表明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和这个革命所宣告的“理性王国”也普遍感到失望。幻想破灭了，代之以痛苦的怀疑，人们强烈要求对现存的社会、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现实主义的分析和评价。

这种分析的方法以思想家的阶级立场为转移。十九世纪头三十年，在西欧的社会政治思想界，明显地出现了三个主要思潮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三派思想家：保守主义—传统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功利主义者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仅体现了不同的知识界的传统，而且也表达了不同的社会阶级的利益。

保守主义—传统主义者（他们也被称为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如爱德蒙·伯克（1729—1797年）、路易·德·博纳尔（1754—1840年）、约瑟夫·德·梅斯特尔（1754—1821年）等人，对1789年法

^① 卢达分子运动，指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英国工人自发捣毁工厂机器的运动。——译者